

爱尔兰研究在中国：蓬勃发展的新兴学科

陈 丽

中爱两国国土面积相差甚远，地理和文化上的差异也颇为明显，因此在许多人看来，中国似乎与爱尔兰渊源甚浅。然而，近十年来间，爱尔兰研究却在中国蓬勃发展，经历了从无到有的学科建设过程，并在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上蓬勃发展，取得了喜人的成绩。如今，简要地回顾一下爱尔兰研究作为一个新兴的学术研究领域的崛起过程，或许能够解释说明，为什么尽管爱尔兰与中国存在巨大的地理和文化差异，但爱尔兰研究却仍然能够在中国成长为一门蓬勃发展的新兴学科。

中国知识界对爱尔兰历史和文化的浓厚兴趣由来已久，早在爱尔兰研究崛起成为独立学科之前便早已存在，产生过不少优秀的爱尔兰文学和历史方面的译介和研究作品。简要说来，爱尔兰研究在中国可以大致分为两个主要的阶段：二十世纪早期的第一阶段，和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至今的第二阶段。在第一个阶段，危难中的中国正急切地寻找应对自身政治危机的文化出路，新文化运动在向西方寻找出路的过程中对爱尔兰活跃的政治和文化局势予以了密切的关注；在第二阶段，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迅速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催生了中国知识分子对外国文化的高度兴趣，而凯尔特虎的经济崛起和文化繁荣也促使爱尔兰研究在中国迅速崛起，成为一块新兴的学术研究领域。

第一阶段：早期接触

政治上，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世纪之交，中国和爱尔兰都深陷政治危机之中。爱尔兰努力抗争，试图摆脱几个世纪以来的英国殖民统治，建立民族独立国家。中国则深陷军阀混战和外国势力侵略的内忧外患之中，而且英帝国殖民势力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英帝国是最早威胁清朝统治的外国势力之一，第一次中英鸦片战争（1839-1842）开启了西方势力和日本对中国长达一个多世纪的蚕食和侵略（1839-1949），标志了中国“百年国耻”的开端。即使在 1912

年中华民国建立之后，中国的政局仍然缺乏稳定的中央政府领导，因为军阀混战（1916-28）、日本侵华（1931-45）和国共内战（1927-49）等原因而时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文化上，中爱双方的学者有着相似的目标：通过文学艺术的百花齐放来探讨民族解放的政治出路。不过，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中爱学者却转向了迥然相异的方向来寻求灵感。在叶芝的带领下，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的文人学者们转向前殖民时代的古老凯尔特文化，企图借之另起炉灶，统一各派系的政治分歧，创造出一个不同于英国文化传统的文化建国基础。而二十世纪初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中国学者则对几千年儒家文化的压迫性影响心存不满，主张文化改革，转向西方寻求新的科学技术和政治策略。西学东渐的努力从早期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实用目标出发，逐渐在深度和广度上辐射开来，将文学艺术也囊括在内。二十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本质上就是一场“文学的革命”，催生了迥异于先前的文言文传统文学的白话文现代文学。

因此，在一定意义上，中国的爱尔兰研究可以一直追溯到二十世纪早期，哪怕那时的“爱尔兰”还不被承认为独立国家，爱尔兰研究的名称也尚不存在。新文化运动时期，鲁迅（1881-1936）、茅盾（1896-1981）和郭沫若（1892-1978）等知识分子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文化，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民主反对独裁，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爱尔兰独立运动及其相关的文学运动（爱尔兰文艺复兴）几乎与中国的政治文化努力同时发生，中国知识分子在探求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政治和文化方案的过程中，密切关注了爱尔兰民族独立的政治斗争和文艺理念，以期从中得到宝贵的经验教训。

这一时期，爱尔兰的政治问题和文学作品被大量译介给中国的读者。《东方杂志》（1904-1948）和《小说月报》（1910- ）等刊物高度关注爱尔兰的时局进展。用“爱尔兰”这一关键词来搜索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全文检索数据库（<http://cpem.cp.com.cn/Search>），结果显示在该刊物存在的四十多年间刊发了 800 多篇的相关文献，其中爱尔兰独立战争结束的 1921 年，一年便刊发了 72 篇文章，达到最高值。许多文章密切跟踪和分析重要的爱尔兰政治事件，例如章燮臣的《爱尔兰自治法案》（1912 年 9 卷 1 期）、许家庆的《爱尔兰叛乱之真相》（1916 年 13 卷 8 期）、于世秀的《大不列颠与爱尔兰之历史关系及和议之经过》

（1922年19卷4期）等等。除此之外，文学作品的译介和研究也占了不少篇幅。文学在这一时期，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爱尔兰，都与政治风云紧密相联，发挥了积极作用。

爱尔兰文艺复兴，尤其是叶芝领导的戏剧运动，十分吸引中国的学者。1920年3月，《东方杂志》（17卷6期）刊登了署名“雁冰”（即茅盾）的重要评论文章《近代文学的反流——爱尔兰的新文学》，及其翻译的叶芝剧作《沙漏》（该作品是中国最早的叶芝作品翻译）。在其评论文章中，茅盾总结了爱尔兰文学运动的“反流”性质：

大家讨论社会问题的时候，爱尔兰文学却表现那离于现社会生活的先民的自然生活；大家注重实际的描写，用社会心理学做根据，表现极复杂的社会生活，他们却简单的注意在一处一二人；大家用怀疑态度做剧本，什么问题都讨论，开方案，却不配药，他们都用径直决断的态度；大家都问将来如何？都趋向世界化，不限于局部的讨论和表现，他们却偏注意自己历史的民族的特色。所以在近代文学中，爱尔兰文学自成一派。（73）

叶芝最早引起中国学者的兴趣，并非纯粹因为其艺术上的成就，而更主要的是因为他对爱尔兰民族主义事业的积极贡献。考虑到中国当时的局势，这一点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叶芝获得192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后，他在中国的译介也达到新的高度，许多作品被翻译成中文，《小说月报》还推出一期专刊（1923年14卷12期）介绍叶芝。王统照（1897-1957）和郑振铎（1898-1958）是这一时期主要的叶芝翻译者和研究者。

其他的爱尔兰主要作家也在这一时期得以被译介给中国读者。虽然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 1856-1950）和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 1854-1900）常被贴上英国作家的标签，但是格雷戈里夫人（Lady Augusta Gregory, 1852-1932）、乔治·拉塞尔（A.E. or George Russell, 1867-1935）和约翰·辛格等是实实在在地被当作爱尔兰作家加以推介。萧伯纳和王尔德的大部分作品都在这一时期被译为中文。格雷戈里夫人的爱国剧《月出》（*The Rising of the Moon*）也被译为中文，并

有据此改编的戏剧《三江好》演出，反响强烈。茅盾和赵景深（1902-1985）不断给《小说月报》投稿，持续更新爱尔兰文化界的最新动态。1929年，中国现代戏剧的创始人之一、国歌作者田汉（1898-1968）出版了《爱尔兰近代剧概论》（上海：东南书店），成为迄今为止篇幅最长的研究爱尔兰文艺复兴时期主要作家作品的著作。

近年来的研究提供了更多有趣的关于这些早期接触的细节。倪平的《萧伯纳与中国》（2001）用中文写就，详述了萧伯纳 1933 年的访华经历，而加拿大作家卡伊·李（Kay Li）的英文专著《萧伯纳与中国：跨文化接触》（2009）则由美国佛罗里达大学出版社出版，从海外华人的视角呈现了这次重要的文学会晤。杰鲁莎·麦柯马克（Jerusha McCormack）在研究中爱双边关系的过程中重新发掘出郭沫若在 1920 年所做的一首名为《胜利的死》的长诗。诗人在惊闻爱尔兰独立军领袖、新芬党员马克·斯威尼（Terence MacSwiney, 1879-1920）在狱中绝食而随后致死的消息后，创作了该诗。诗人用“爱尔兰的伯夷、叔齐”来指称马克·斯威尼，并用“自由之神终会要加护你们……因为你们是自由神的化身故！”等诗行来称赞其为了民族独立自愿牺牲的精神。

而且，这一跨文化接触的兴趣并不仅仅局限于政治领域。叶芝对中国哲学的兴趣近年来也得到学者们的关注。傅浩在其 1996 年的论文《叶芝诗中的东方因素》中探讨了叶芝诗中体现出的其对印度、日本和中国哲学理解的偏差，这一角度对于中国读者相当有用，因为后者并不一定会意识到叶芝的理解会与自己的理解有所不同。其中一个例子便是轮回的概念，在《摩希尼·查特基》、《拜占廷》、《驶向拜占廷》、《天青石雕》等诗中，叶芝认为轮回转世是对死亡的超越，人类得以实现长生：“生的时刻与死的时刻相遇……人们以不死的双脚跳舞”（《摩希尼·查特基》）。然而，在佛教和印度教的观念中，轮回是指灵魂在六种存在状态之间的轮流投身赋形，而要获得永恒的幸福，就必须脱离轮回，不再投生。傅浩进一步指出，虽然叶芝只有一首诗《天青石雕》直接涉及中国文化，但是叶芝通过庞德受益于中国文化的程度要大于通常评论所理解的程度。而对反方向文化影响的研究，一个杰出的例子是杰鲁莎·麦柯马克的研究。她在 2007 年（及随后的研究中）指出庄子对爱尔兰作家王尔德的影响，认为庄子哲学在王尔德的文学美学的养成上起到了关键作用。此外，不断有学者研究鲁迅和乔伊斯之间的文学

相近性，以及叶芝对中国第一批现代诗人——如穆旦（1918-1977）、卞之琳（1910-2000）和袁可嘉（1921-2008）等——的影响，从比较学科的角度提供了一些启发性的创见，供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些文学大家。

第二阶段：现代发展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斯威夫特和萧伯纳等个别爱尔兰作家得到新的阐释和接受，着眼点多在于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有力批判以及对工人阶级的明显同情。马克思和恩格斯均支持爱尔兰民族解放事业，认为它是全球工人阶级反资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受此鼓舞，中国学者早在 1974 年便翻译出版了爱尔兰现代历史上的第一本历史书：埃德蒙·柯蒂斯（Edmund Curtis）的《爱尔兰历史》（1936）。

不过，中国对爱尔兰文学文化的研究兴趣，第二阶段的产生背景与第一阶段有很大的不同。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叶以来，与“凯尔特虎”的经济崛起相伴相随的是爱尔兰在文学上的“第二次文艺复兴”。爱尔兰政府和文化机构做出了不懈的努力来推广其文化繁荣，而遍布全球的庞大爱尔兰移民人口也有助于促使这朵文学之花全球绽放。与此同时，爱尔兰的成功给中国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例子。快速全球化的中国也在寻求经济的成功和世界舞台上的文学表达，2012 年莫言（1955- ）成为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这一文学表达获得的世界级认可。

真正的变化发生在中国改革开放和中爱 1979 年建立外交关系之后。伴随着中国高校内学科建设的蓬勃发展，爱尔兰研究已经崛起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在过去的十年间，多所高校设立爱尔兰研究中心，例如北京外国语大学、南京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等高校的爱尔兰研究中心，以及湖南师范大学的英国和爱尔兰文学中心等等。

这其中，北京外国语大学具有悠久的爱尔兰研究历史。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王佐良教授（1916-1995）便在北外外国文学研究所设立了凯尔特文学中心，是我国唯一从事爱尔兰文学、威尔士文学、苏格兰地区文学研究的机构。陈恕教授（1937-2017）是改革开放后我国访问爱尔兰的首批学者之一。2007 年，北外爱尔兰研究中心正式成立，成为中国爱尔兰研究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跨

学科研究中心。在双方政府、北外、爱尔兰国立梅努斯大学、都柏林大学、科克大学和都柏林圣三一学院等多方面的协作努力之下，北外爱尔兰研究中心快速发展。许多知名的爱尔兰研究专家，例如德莫·基奥（Dermot Keogh）、玛格丽特·凯勒（Margaret Kelleher）和杰鲁莎·麦柯马克等，都曾来该中心授课；此外还不断有知名爱尔兰作家造访中心并做讲座，例如塞巴斯蒂安·巴里（Sebastian Barry）、德莫·博格（Dermot Bolger）、帕蒂·布什（Paddy Bushe）、德蒙·伊根（Desmond Egan）、雨果·哈密尔顿（Hugo Hamilton）、德尔德雷·马登（Deirdre Madden）和科勒姆·托宾（Colm Tóibín）等等。

如今，北外的爱尔兰研究中心每两年招生一次，提供爱尔兰文学与文化，和爱尔兰政治与经济两个方面的硕士学位。2010 年起，该中心引入了一年的爱尔兰语教学项目，面向本科生和研究生层面授课。自 2016 年以来，北外和爱尔兰两所最为知名的大学——圣三一学院和都柏林大学——签署了合作协议，在双方政府提供的奖学金资助下开展学生交换合作。2018 年 6 月，该中心的一名硕士生成功申请到都柏林大学和中国留学基金委联合资助的博士奖学金，前往都柏林大学继续其博士阶段的学习，标志着双方在培养高水平专业人才方面迈出了新的合作步伐。

此外，2014 年 3 月，在爱尔兰外交与贸易部的部分资助下，中国的爱尔兰研究中心合作成立了“中国爱尔兰研究网络”，旨在促进国内相关领域学者的学术交流与合作。该网络成立后，其会员单位组织了一系列的文化与学术活动，仅 2014 年一年便有两场国际学术研讨会，分别是北外举行的“二十世纪爱尔兰文学、文化与国家建构”国际学术研讨会和上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举行的“爱尔兰的凯尔特文学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此外，上海师范大学每年召开学术沙龙，纪念爱尔兰作家，过去三年的主题分别是叶芝（2015）、布莱恩·弗莱尔（2016）和约翰·辛格（2017）。2018 年 6 月 15-17 日，各研究中心的学者们齐聚上海，既是庆祝布鲁日，也以“爱尔兰研究在中国”为题探讨了学术合作的问题。随着中爱建交四十周年庆典的临近，还有更多的纪念活动正在策划之中，这其中就包括本书的出版。

此外，一些主要的爱尔兰作家，诸如斯威夫特、王尔德、叶芝、贝克特和乔伊斯等，已经成为英语文学的典范，被绝大多数中国高校英语系纳入其教学内容

体系，只不过有些院校并没有将爱尔兰研究专项列出，而是将上述这些作家笼统地列在英语文学或者英国文学等标题之下。这些课程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爱尔兰研究在中国的影响，因为师生们很快就会意识到文学文本与其社会和历史环境是分不开的。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作家，他们必须了解更多的爱尔兰知识。

第三阶段：出版成果

文学研究一向是国内爱尔兰研究的一个主要领域，国内学者在这一领域已经取得相当令人瞩目的成就。主要作家的主要作品，作为译者和出版社的首要选择，已经大部分被翻译出版。诸如贝克特、乔伊斯、萧伯纳、叶芝和王尔特等主要作家，其主要作品通常都不止一个翻译版本。近年来，翻译方面的主要成就就要数乔伊斯的《尤里西斯》和《芬尼根的守灵夜》中译本的出版，以及《贝克特全集》的出版。

《尤里西斯》中译本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一经出版便引发了巨大的反响和关注。这不仅仅是因为该书出了名地难读难译，还因为两个均出自名家之手的独立译本前后推出，难免引发学界对两个版本之间的众多比较和争论。萧乾（1910-1999）和文洁若（1927- ）夫妇于 1994 年 4 月与译林出版社合作推出《尤里西斯》译本的第一卷，并于半年后出齐全卷。而知名乔伊斯研究学者金隄（1921-2008）则先是与台湾九歌出版社合作，于 1993 年出版繁体字印刷的第一卷译本，后又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合作于 1996 年出版简体字全译本。另外一项同样令人叹为观止的乔伊斯翻译工作则由戴从容完成：她的《芬尼根的守灵夜》中译本于 2012 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首印 8000 册上市三周即告售罄，创下了“天书”销售的奇迹（详见戴文）。此外，自 2012 至 2015 年间，上海译文出版社陆续出版了七卷本的《乔伊斯文集》，不仅涵盖《都柏林人》、《青年艺术家的画像》、《尤里西斯》等经典小说，还囊括了《书信集》、《文论政论集》、《诗歌·剧作·随笔集》等以往较为少见的作品。2016 年，正值贝克特诞辰 110 周年之际，湖南文艺出版社重磅推出《贝克特全集》。这套中文版全集多达 22 卷，收录了这位诺贝尔奖得主的全部作品，包括诗歌、小说、短篇小说、戏剧和文学评论等，堪称全球收录最全的贝克特作品集。

除了经典作品之外，当代的爱尔兰文学作品也被中国学界密切关注、翻译和研究，重要的事件和奖项均会得到新闻媒体的迅速报导。每年爱尔兰国庆日圣帕特里克节的前后，爱尔兰驻华大使馆会邀请一些重要的当代作家来访，在中国主要城市巡回宣传，极大地促进了当代爱尔兰文学在中国读者中的知名度。与此同时，新一代中国读者群体对西方文学，尤其是英语文学，的熟悉喜爱程度也有利于爱尔兰当代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传播。当代爱尔兰作家，诸如约翰·班维尔（John Banville）、塞巴斯蒂安·巴里（Sebastian Barry）、玛丽娜·卡尔（Marina Carr）、安妮·恩莱特（Anne Enright）、科勒姆·麦凯恩（Colum McCann）、马丁·麦克唐纳（Martin McDonagh）、科勒姆·托宾（Colm Tóibín）和威廉·特雷弗（William Trevor）等，其主要作品均已被译为中文，且有时还不止一个版本。

与此同时，随着舞台剧在中国观众中的逐渐走俏，早已得到西方世界认可的爱尔兰当代戏剧也步上了中国的舞台，有些是用英文演出，但大多数是以中文演出，以吸引更多的观众。除了贝克特的《等待戈多》等经典作品之外，当代戏剧作品——如布莱恩·弗里尔的《恋人》、马丁·麦克唐纳的《丽南山的美人》和《枕头人》等等——在北京、上海等地的多所艺术剧院里经常演出。此外，两国戏剧界还不断尝试各种形式的艺术合作。2016年，作为爱尔兰庆祝中国春节的活动之一，成都艺术剧院的中国表演者们远赴爱尔兰，巡回演出了实验话剧《海鸥和别的鸟》。该剧改编自契柯夫原著剧本《海鸥》，在导演盖文·昆火（Gavin Quinn）的指导下，最早由爱尔兰潘潘剧场（Pan Pan Theatre）在2014年都柏林戏剧节上首演。之后，导演昆火与中国方面合作将它搬上中国的舞台，而现在又由中国演员将之送到了爱尔兰巡演。

研究类出版文献自1990年以来增长明显，反映了爱尔兰研究作为一个独立学科近年来在中国高校内的蓬勃发展。与翻译的情况类似，主要作家的主要作品是目前占据主流的研究对象。据中国知网的数据，叶芝、贝克特、乔伊斯和王尔德是国内研究最多的爱尔兰作家。近年来的一些研究成果有戴从容的《自由之书：〈芬尼根的守灵〉解读》（2007）、王珏的《叶芝中期抒情诗中的戏剧化叙事策略》（2014）、施清婧的《中国舞台上的塞缪尔·贝克特——跨文化戏剧演出研究（1964-2011）》（2015）和曹波的《贝克特“失败”小说研究》（2015）等等。

与此同时，学者们的研究兴趣也在迅速扩展，不再局限于经典的作家作品，

对当代文学作品的关注也呈逐渐上升趋势。陈丽的《时间十字架上的玫瑰——二十世纪爱尔兰大房子小说》(2009)和《爱尔兰文艺复兴与民族身份塑造》(2016)、李成坚的《当代爱尔兰戏剧研究》(2015)、田菊的《爱尔兰戏剧运动在中国的百年回响》仅是近期的几个例子。

除了文学翻译和研究的兴盛之外,爱尔兰研究的其他领域,例如历史、宗教和政治研究等,也都在过去的十来年间经历了快速的发展。两本影响深远的历史著作——罗伯特·李的《爱尔兰历史》和德莫·基奥的《二十世纪爱尔兰史》——分别于2010和2017年译为中文出版。2016年还出版了两本传记的中译本:作家罗迪·多伊尔和著名爱尔兰足球运动员罗伊·基恩合著的《基恩:下半场》,以及理查德·埃尔曼所著的《乔伊斯传》(基恩与乔伊斯这两个名字的并列,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读者对爱尔兰的兴趣之广)。此外,两本颇具前沿性的研究论文集:《中国与爱尔兰》(杰鲁莎·麦柯马克编,英文版2009年;中文版2010年)和《中爱关系:跨文化视角》(王展鹏编,2011年)集中展示了有关中爱双边关系研究的新成果、新视角。

除了专著之外,爱尔兰研究各领域的期刊文章和硕博士论文也呈大量增长的态势。尽管国内尚无专门的爱尔兰研究期刊,《外国文学评论》、《外国文学》、《当代外国文学》、《欧洲研究》、《国际问题研究》、《历史研究》等专业期刊都高度关注中外爱尔兰研究的发展动态。此外还出现了专门为中国学生设计的爱尔兰方向教科书。杰鲁莎·麦柯马克教授于2005年为《英语国家社会与文化入门》(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初版,2010、2017再版)一书贡献了四章的爱尔兰专项内容:历史、政治、政府与文化,首次在国内教材中全面介绍了爱尔兰共和国的具体情况。从大多数国人错误地以为爱尔兰只是英国的一个地区,到如今教科书中将其列入主要的“英语国家”之列,这一变化本身便彰显了中爱关系近年来发生的巨大变化,以及中国的爱尔兰研究的蓬勃发展。而在爱尔兰文学的教材方面,陈恕教授的《爱尔兰文学作品选读》(2004)和《爱尔兰文学》(2000)是最具代表性的出版物。前者收录了45篇从七世纪至当代的爱尔兰英语文学作品的选段并附简短的评注,旨在让学生能够全面地了解和接触重要爱尔兰作品的原文本。而后一本书则是以中文写就的一部爱尔兰文学史,详细介绍了包括凯尔特文学和英语文学在内的爱尔兰文学历史,前半部用三部分介绍了从五世纪至十

七世纪的凯尔特文学历史，后半部分则用十章介绍了自 17 世纪以来的爱尔兰英语文学的主要阶段。

近年来，借助全球爱尔兰流散人口的广泛分布，以及爱尔兰在全球经济和政治格局中重要性的上升，爱尔兰研究也在全球各地开花结果。尽管中爱双方在人口数量、国土面积、文化风俗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但是两国之间的共同之处远超想象。爱尔兰研究的种子在中国已经生根发芽，相信未来经过中外学者的更多学术合作与努力，会很快长成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

与此同时，反向的研究工作亟需加强：我们需要更多地将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向外翻译和推介，使得中国学者能够更多地参与到国际的学术合作与交流当中，发出中国的声音。中国学者已经意识到这一点的重要性并且开始了这方面的努力（本文便是一个小小的证明）。此外，2017 年爱尔兰文学研究国际协会的年会在新加坡举行，这是该年会自新世纪以来首次在亚洲举行。会议见证了大批亚洲学者，尤其是中国学者，的积极参与，反映出亚洲学者和欧洲同行双方面的加强学术联系的共同愿望，也是中爱两国在加强交流与合作上的又一硕果。